

Globethics Repository



《大國學視野中的漢語學術聖經學》序二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Huang, Paulos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Download date	2026-09-10 16:05:1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42

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圣经文学*

黄 保 罗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重新界定“大国学”概念,为汉语学术神学特别是圣经文学的合法性提供学理平台。全文分四部分:“大国学”是汉语语境中基督教经典研究的背景框架、“汉语学术神学”是“汉语学术圣经学”的具体语境,以及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文学。

关键词:大国学;一首两翼四足一尾;汉语学术神学;圣经学;圣经文学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the Great *Guoxue*

Paulos Hua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uthor aims to offer an academic

* 本文主要内容据笔者在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经典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The Christian Classics and Hermeneutic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4-7.12.2009, 成都)的报告《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修订而成。

platform for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especially Sino-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through a redefinition to the concept Great *Guoxue* in this article, which has been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The Great *Guoxue* is the background framework of the Sino-Biblical Literature Study, 2)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is the concrete context of the Sino-Biblical Literature Study, 3) The Sino-Biblical Study in the light of the Great *Guoxue*, and 4) The Sino-Biblical Literature Study in the light of the Great *Guoxue*.

Key words: The Great *Guoxue*; one-head two-wings four-legs with one tail;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Biblical Study;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y

作为华人,深受“民族情”和“强国梦”的影响,笔者努力在汉语学界呼吁同仁思考欧美社会“软实力”的精神体系——基督教。为此而倡导“汉语学术神学”的学习和研究,目的不是要简单地改变汉语学科体系的设置,而是强调在知识型结构的层面上增加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研究的认识 and 了解。故而,近年来,笔者出版《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①之后,一直在努力以“汉语学术神学”为题进行讲学和撰写系列丛书。笔者即将出版的《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就是此类思索的初步成果之一。

本文主要通过介绍该书来讨论汉语学术圣经学这个话题,借着重新界定“大国学”这个概念来为汉语学术神学(特别是汉语学术圣经学)在汉语学术界的合法性进行论证。^②

① 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② 黄保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学术神学丛书之二,主编卓新平,副主编黄保罗、游斌;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本文的基本内容从拙作提炼而来,特此注明。

一、“大国学”是汉语语境中 基督教经典研究的背景框架

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为了真正地解决基督教经典研究的合法性问题,笔者主张把基督教经典放入“大国学”框架之内。这不是为了赶“国学热”的热闹,而是因为目前“国学”的讨论有着严重的狭隘民族主义与排斥主义的倾向。这是当代中国的真实语境,基督教经典研究应该了解、适应这个语境,并能从学术真理的视角来影响甚至改造该语境中的狭隘与偏颇之处;所以,“大国学”是汉语语境中基督教经典研究的背景框架,若不处理这个问题,基督教及其经典研究将可能处于被误解、轻视甚至排斥的境地。

“国学”概念,乃相对于“西学”而言。根据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钱穆等人的论述,国学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门类,但有些学者把“国学”等同于中国固有之传统学甚至就是儒学。在如此的学术构架中,基督教经典很容易被当成外来文化而受到排斥。即使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了,中国人骨子里的“自傲”与心灵深处的“仇恨记忆”与“苦毒心态”,常常还是会引起狭隘民族主义式的排他。一方面,出于“自傲”而对日渐受到世界文化冲击的现状,产生了焦虑感,因此,以基督教等来源于西方的文化元素作为想象中的敌人进行排斥。^①另一方面,出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仇恨和屈辱记忆,而努力通过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排斥抹黑外来元素为

① 可参考刘建平从建立有国际关系史根据的世界观,寻求有中国政治史根据的改革共识和认识精英思想却为与民粹清虚崛起的因果关系等三方面分析了中国某些人的焦虑病。刘建平:“边缘性焦虑:‘不高兴’中国的病理分析”,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8期,第14-20页。香港孔子学院院长汤恩佳在各地赠送孔子铜像,推广孔教,他曾多次表达了焦虑感,并把基督教等在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参见《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卷一至五),香港孔教学院荣誉出版。

“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①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为中国的崛起带来动力,但其病态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追求客观的真理,笔者认为需要突破上述狭隘的“国学”观而提倡包容中外元素的“大国学”。这不仅仅是把国学作为一种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学问,而是把它当作代表中国形象及其生存和发展动力的学问,而且大国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②

在目前的汉语语境中,笔者曾根据汤因比的历史发展理论,提出一国之学应该研究文明单位面对“挑战”来制定“应战”的“自我决策和执行”的过程,而今天讨论国学,显然就是探讨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应战新的挑战之学问。同时,根据“自我认同”是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是“了解我占据的立场”、“我的同一性由能为我提供某种框架或视域的介入和识别活动所界定,在这个框架或视界之中,我试图判断什么是善的、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所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这是我借以采取立场的视界”等理论,笔者认为,“国学”应该反映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即“中国形象”。^③从概念的界定而言,大国学应该是研究代表中国形象(Image of China)的“软件”体系的学问、应该为中国文明如何适应挑战而提出迎战策略的学问,它 1)应该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identity),即告诉人们“中国人”是

① 可参考任剑涛从后发劣势与国家认同的困局、怨恨情绪、民族主义的建构性与否定性、超越情绪宣泄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不高兴》所代表的处于国家认同与怨恨记忆之间的窘迫的民族主义。任剑涛:《窘迫的民族主义——在国家认同与怨恨记忆之间》,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8期,第4-13页。

② 结合2010年上海世博会,笔者认为中国形象应该是经历了一个从“天朝帝国”、“世界强国”到“文明之邦”的发展和转变过程。参见黄保罗:《从“天朝帝国”到“文明之邦”——2010年上海世博会所反映的中国国家形象》,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③ 参见黄保罗:《从欧美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载2010年3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68期第13版。

什么样的人? 2)能够客观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实况,回答“中国文化”是什么? 3)可以有效支持中国“硬件”运行,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勾勒出影响和决定中国人及中国行动的内在体系是什么。因此,“大国学”应该可以客观地描述和清楚地解释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体系,并能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而且具有执行力。

在全球化的21世纪语境中,代表中国形象的大国学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指其身体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民族(如西夏、契丹等)和现当代的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有机活体。

中国文化之“首”(领导者)是“政权”,从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今天为止,政权对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就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邓三科)都是政权思想的体现。

中外、“我他”两大文化源头之“两翼”,不但表示所有的中国文化元素就其来源可分成“中、外”两类,而且它是处理中华文化构成元素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古代的华夷之分和今天的爱国与否,都往往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映。一方面,出于“自傲”而对日渐受到世界文化冲击的现状,产生了焦虑感,因此,以基督教等来源于西方的文化元素作为假想敌进行排斥。另一方面,出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记忆,而努力通过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排斥抹黑外来元素为“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对于这种两翼式的思维模式,政府和民众对此都应该有保留地利用,而不能完全认可。但从现象学的层面,撇开价值判断,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特色之一。

四足则是中国文明的实际组成部分:腿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义、以人为本);腿二是中国固有之足(儒、道、民间信仰);腿

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虽是外来的,却获得了认可而成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自由主义或理性、科学);腿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来的元素,虽然居住于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而言已经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众的情感和草根阶层中,却仍被视为外来的非中国之足(基督教、伊斯兰)。

一尾则代表新兴宗教及其他没有概括进来的文明元素。

至于这个被研究的有机体到底是一条活龙、一只凤凰、一只熊猫还是温驯的鸽子,如何以某个图腾来勾勒才能更有美感,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①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如今语境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中国的命运与世界息息相关,同在一个地球村的现实,使得中国的软件体系和运行模式有很大变化。笔者的上述图腾作为大国学的内容,可以代表中国的形象,可以解决对内与对外两方面的问题,对内具有解释力和凝聚力(Chinese Image's Ability of Explanation and the Power of Uniting Chinese People together),对外具有健康性和宣传力(Chinese Image's Health and Propaganda Ability)。这

① 关于这个观点,笔者曾于2007-2009年间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黑龙江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讲学,以讲课稿为基础完成了《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书稿25万字,即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黄保罗著、周永译:《儒家、基督教与救赎——附18篇关于汉语学术神学的对话与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附录18对此也有论述。以此为题,笔者曾撰文《全球对话主义视野中的大国学——兼与金惠敏教授对话》,发表于河南大学《差异》杂志2009年秋季刊,《汉语学术对话神学的构建——追随利玛窦的脚踪》一文将刊于陈声柏主编《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在浙江大学“文明对话与对话文明:21世纪佛教与基督教的相遇国际学术论坛”和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汉语与跨文化交流”的发言中阐述了“大国学”的概念。因为此乃新概念,为了推广及交流,上述各处发言及所写文章中有重复部分,也有相互冲突不吻合之处,因此此概念本身仍在不断改进之中,特此说明。

能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学观”而促使国人向世界展示一个健康和与人为善的文明中国,增加宣传力度。^①

有了上述“大国学”的框架,基督教经典特别是圣经研究的合法性才能较好地解决,这应该是汉语语境中基督教经典研究的大背景。

二、“汉语学术神学”是“汉语学术圣经学”的具体语境

在上述大背景之中,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是被当作学术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笔者将此称为“汉语学术圣经学”,它是笔者所云的“汉语学术神学”^②的一个部分。“汉语学术神学”则是“汉语学术圣经学”的具体语境。

首先,由于政治、文化与学术规范的原因,基督教及其经典的研究,在中国大陆的过去曾是被禁止、被轻视和被误解的。通过

① 正如鲁迅所比喻的:如果你的嘴里并没有“毒牙”,那何必在自己的额头上写上“螭蛇”二字,引人来打杀呢?所以,我们对外要向世界解释说明“中国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的问题。有关论述,参见黄保罗:《从欧美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载2010年3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68期第13版。

② 拙著《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出版后,笔者所得到的一个主要批评意见是,该书仍然主要是“西方化”和“教会化”的视角;可能笔者对此界说不明,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正性的进一步说明。“汉语学术圣经学”不同于基督教会传统所说的“神学”,因为后者以“信仰”为最高标准;也不同于汉语学界所常说的“宗教学”,因为后者强调不可能的客观与中立而往往将“神学”视为教会的专利并把它排斥在学术殿堂之外。笔者所说的“汉语学术圣经学”是“对基督教进行的科学研究”(the Science of Christianity)的“汉语学术神学”的一个部分,它是:1)研究基督教的学术;2)是汉语的(语言和文化);3)是学术性而非教会性的,它不受教会神学的限制,但也不排斥它,而是努力对之进行理性分析。这与传统的教会神学以及学术性的宗教学都密切相关,而又不完全相同。笔者所云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就是在这个概念下进行的,如此构建的目的,是为了从知识结构上为学者提供一个参考,了解教会和西方学术界研究基督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文化基督徒”和“汉语神学”等推动者们的努力,基督教神学在大陆学术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①其次,部分“汉语神学”研究者出现了刻意排斥“教会神学”的倾向,而教会背景人士则对教会外神学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信者的神学是否就一定非学术性以及非信者的神学是否就一定是学术性,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第三,将“神学”概念技术语理解为“教会性”而非“学术性”是现在大陆学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神学”这一概念理解的狭隘化非常严重。笔者认为,若只是出于政治困难之因,用“基督宗教研究”来代替“基督宗教神学”,虽有可以理解的根据,但却是在自废过去多年来的“汉语神学”之努力。若学界人士认为,只有教会基督教进行的研究才叫“神

① 如刘小枫在1990年代及道风山所进行的工作,是其重要部分。

② 此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汉语神学早期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研究者的认信问题来讨论教会神学与汉语神学的关系。笔者在《汉语学术神学》中对此有论述,此不多赘。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可以有个人化的(personal)或者学术性(scholarly)的路径(approach),可以有内部(internal)或者外部(External)的视角(perspective)。以汉语学术神学的基督教研究为例,可以出现的情况有:一个人以信徒的身份(personal 个人化)从基督教内部(internal)来研究基督教,一个人以信徒的身份(personal)从基督教外部(external)来研究基督教,一个人以学者的身份(scholarly)从基督教内部(internal)来研究基督教,及一个人以学者的身份(scholarly)从基督教外部(external)来研究基督教。在2009年9月19-2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主办的“Nordic Network for Studies of Church and Theology in China”论坛中,挪威神学家欧传基(Rolv Oslen)提出这两种视角作为分析基督教神学研究的标准。此后,笔者在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就此进行演讲,努力对之进行完善。此论实际可追溯到描述阿拉伯公主的“约哈瑞之窗”(The Johari Window),它于1950年代由Joseph Luft和Harrington Ingham而提出,是一种描绘个人意识的模式(a model for mapping personality awareness)。据此笔者于2010年3月21-27日在同济大学与苏州大学举办的“第四届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中,提交了《作为汉语神学分支之一的汉语学术神学——并回应曹剑波、郭鸿标、赖品超教授》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

学”,那则是误解了。^①笔者赞成卓新平教授的“学术神学”概念,^②因为“神学”来自于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后虽被专门指称基督教研究,但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教会的信徒与学术界的非信者对基督教的研究都被称呼“神学”。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个历史背景,为“神学”术语进行“脱敏”,即不应该将“神学”排斥出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第四,将“神学”狭隘化为“哲学”的一个部分是学界的又一问题,以至于西方神学传统中的圣经研究、教会历史研究与实践神学都被不同程度地排斥到了“汉语神学”之外。这些现象都有待改进。^③

为此,笔者把神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神学(Theology I)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实践,如祷告(prayer)、圣经(scripture)、礼拜(service)、圣礼(sacraments)等,是局内人基督徒内在的、个人化的和独特的(internal、individual and special)。第二层神学(Theology II,即非理性排基实践)是对基督教进行批评和拥护的非理性实践,体现了局外人的个人前见(立场和观点),是局外人身份与个人化认识路径(external and personal)的结合。就汉语语境而言,中国社会草根阶层及学术界部分只从自己的非信徒前见

① 赖品超:《宗教研究、神学与汉语基督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 Theology and Sino-Christian Studies),载《山道》(香港浸会神学院学刊)(Hill Road, the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 Kong),2009年11月号。赖品超:《从汉语神学到汉语基督宗教研究:汉语神学的传承与发展》,载《第四届汉语基督宗教研究圆桌会议:汉语基督宗教研究的传承与发展:会议手册》(2010年3月21-27日),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同济大学,第23-37页。

② 卓新平序,见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③ 笔者撰写《汉语学术神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从知识结构上强调对“神学”的广义理解。而笔者的《作为汉语神学分支之一的汉语学术神学》则继续对此论述,载《第四届汉语基督宗教研究圆桌会议:汉语基督宗教研究的传承与发展:会议手册》(2010年3月21-27日),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同济大学,第130-153页。

出发来批评或拥护基督教的实践,是这类神学的代表,可称为“第二层神学:局外人非理性实践”(Theology II: External Irrational Practice)。第三层神学(Theology III)是对基督教信仰实践的内在连贯性(internal coherence)进行研究、对基督教信仰实践的诠释(interpretation)以及对基督教信仰的实践提出建议(proposal),是局内人基督徒从内部进行的学术性的(Christian internal scholarly)研究和分析。第四层神学(Theology IV)是从科学(Sciences)、哲学(Philosophy)、其他宗教比较(comparative Religious)的视角对基督教进行研究,是局外人非基督徒从外部进行的学术性的(non-Christian external scholarly)研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其一,即使第四层的研究者是基督徒,他们也并非从基督教的内部立场出发,而是从外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进行研究。其二,研究者可能会从其他宗教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基督教。其三,研究者可能会从其他的“前见”(presuppositions)出发来研究基督教。笔者提出“汉语学术神学”(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目的在于贯穿这四个层次的神学,第一层次神学的实践是汉语学术神学获得信息和资料的源泉,任何关于基督宗教的研究都应该以此为重要基础。第二层神学是局外人的非理性批评实践,它能帮助局内人更好地反思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第三层神学是局内人(基督徒)从内部进行的学术性研究,是汉语学术神学的参照体系之一,因为他们从理论上梳理了基督宗教信仰,虽然可能会是“迷”中的“当局者”,却代表正统信徒是如何看待自己信仰的。第四层的局外人学术性研究是汉语学术神学的另一个参照体系,代表了“旁观者”的“清醒”。

因此,汉语学术神学既不简单等同于第一层的教会实践,也不简单等同于其他三个层次的神学,而是以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层次的神学为基础对基督教进行的学术性(scholarly)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可划入第四层的国内基督教宗教研究存在着过分排

斥第一与第三层的倾向)。“汉语学术神学”的“学术性”是标准,在此前提下,汉语学术神学兼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对于“局内人”(信徒)来说研究需要以理性为根据,对于“局外人”(非信徒)来说研究需要熟悉信仰的实践和理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其一,汉语学术神学的研究者可以是基督徒,他们有权利从基督教的内部立场出发来研究,但必须以学术立场来研究。其二,汉语学术神学的研究者可以是非基督徒而且可以从其他宗教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基督教,如从佛教、伊斯兰教等立场来研究基督宗教。其三,汉语学术神学的研究者,可能会从宗教之外的其他“前见”(presuppositions)如理性或无神论出发来研究基督宗教,但必须注意学术界追求“客观”的学者往往受这种“前见”的影响而不自知。^①

基于中国语境的特色,笔者无意改变学术界以宗教学统摄基督教研究的体系和学科设置,也无意代替教会和基督徒发声,而是出于追求真理的学术目的,为了多视角地认识基督教,笔者认为汉语学术神学研究界和研究者,有必要了解和认识第一、二、三层次的神学,如此方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第四层神学;同样,第一、三层次的神学也才能更好地被局外人所理解。

为此,笔者继续思索“汉语学术神学”这个概念,并从中国大国的视野来探讨汉语学术圣经学。

① 关于使用“层”的概念之合理性问题以及此处谈及的问题,笔者在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经典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The Christian Classics and Hermeneutic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4-7.12.2009, 成都)的报告《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和“第四届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报告《作为汉语神学分支之一的汉语学术神学——并回应曹剑波、郭鸿标、赖品超教授》中有专门论述,此处概述性转引,特此说明。

三、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

在汉语语境中,圣经研究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30年前,圣经是人不了学术界的被禁者,因此对其误解的观念往往以讹传讹、影响极大。20年来,在汉语神学逐步发展于学界之际,基于对圣经原文希伯来语与希腊语的掌握程度等因素,在热闹的“神学”论坛中,圣经被关注得并不很多。最近一些年来,圣经研究在中国学界日益受到重视,但汉语学术语境中的圣经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与神学日益脱离、渐行渐远的趋势,因为启蒙运动及圣经历史批判学(Enlightenment and Historical Biblical Criticism)和“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学”(Ideological Criticism)对圣经之为“经”的地位和本质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但是,这两大传统却始终无法获得基督徒和基督教会主流的完全接受。

首先,香港圣经研究者李炽昌先生及其培养出一批博士生,在中国大陆的影响日渐壮大。这批学者部分参与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最近和上海三联书店合作编写出版系列圣经研究教材,但总体上他们还是以“历史批判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主义”为主,因此,他们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教会理解圣经的关系问题。其次,至于在国内学界活跃多年的梁工教授继承朱维之的“圣经文学”流派,是另一个主要代表,但它主要存在着“意识形态批判主义”的问题,虽然它主要是从文学的视野对圣经进行研究。第三,在中国现代大学的人文学术制度里多元经学并存的情况下,游斌等主张圣经研究要回归“经”与“经学”,这与笔者主张的圣经神圣意义研究不谋而合;圣经之为“经”的地位本质和特色、缘由是学术研究中不应忽略的层面。^①

^① 游斌:《走向汉语学术语境的基督教经学》,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31期,2009秋,第50页。

但笔者并非只是强调上述第三类的“圣经经学”研究,而是广义地使用“圣经神学”术语^①,表示“圣经研究的通称和总称”,因此,也可以称为“圣经学”(或“圣经研究”)。为了免于误导读者,笔者现在采用“圣经学”(Biblical Studies)这个名称,旨在从中国大国学的视野来言简意赅地向初学者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圣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第二,在汉语学术界,应该怎么研究圣经?

在阐述了“作为汉语语境的大国学”和“作为圣经研究上位范畴的汉语学术神学”之后,笔者参考了中国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的经学研究法,努力避免简单的中西二元思维解构,主张把圣经当作丰富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文本、神圣经典和文学作品来进行研究,这三个方面应该兼而顾之。笔者强调多元性方法、视角和维度,而不是单从教会教义、历史观点或某种教会外的意识形态出发,希望努力把“汉语学术圣经学”放进体现全球对话主义的“真正的大国学”概念中进行考察。国学这个概念近几年特别流行,国内许多大学都办起了国学院,可是,关于国学复兴,官方态度暧昧,民间意见分歧,因为大家并没有仔细界定这个术语,对其所含的多层意义缺乏明确的了解,且有排斥外来文化的狭隘倾向;而正确定位的大国学则可以为基督教经典研究的合法性提供平台,上文对此已有论述。

因此,所谓的“汉语学术圣经学”(Sino-Christian Academic

① “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可表示不同的意义,根据蔡尔斯(Childs)的传统,一般把这个概念理解为对圣经主题进行系统的神学性诠释,同时还保留圣经的语汇、形象和世界观,因而与“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并不相同,因为后者是通过完整而有序的方法对神学思想进行表述,它往往从圣经神学开始,但并不局限于圣经神学,而且包括了对教会历史中上千年来神学和教义思想的总结和整理,目的是把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系统地表述出来以使人便于认识和了解。Childs: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Biblical Studies),是“汉语学术神学”的一个分支,专门以圣经为研究对象,即在汉语言和文化语境中对圣经进行学术性的研究。^①

笔者结合中国“经学”从“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来构建“汉语学术圣经学”。这一思路,是笔者根据桐城派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论学术语而进行的尝试。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这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内中有三层含义:其一,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姚鼐《谢蕴山诗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其二,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其三,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姚鼐谈义理以端正立言之旨,谈考据以充实作文内容,都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从如何写好文章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作为文章家(“辞章家”)的姚鼐与理学家(“义理派”)、学问家(“考据派”)相异的地方。但在论学层面上,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仍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的藩篱而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不过,姚鼐和桐城派古文家要求把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字表达相统一,实是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根据上述理论,笔者把“汉语学术圣经学”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论”,包括三章:1)“什么是圣经?”2)“圣经语言学”、3)“圣经研究的技术方法”。

第二部分是“圣经义理学”,包括“圣经神圣义理学”和“圣经世俗义理学”两章。但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指程朱理学,而与之相应,圣经的义理也首先是宗教性的作为“经”的意义,在近现代

① 关于中国当代学术界对圣经研究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圣经故事和圣经诗歌的编辑和初探、圣经词典、圣经导读、圣经微观和专题研究、圣经文学研究等,请参考卓新平主编:《中国宗教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8-293页。

理性主义的科学批评兴起之前,圣经在基督教会里一直都是被如此解读的,因此,本部分首先探讨圣经的神圣意义。此外,圣经作为一部人类的文献著作,其中还包含很多人文、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民俗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视野中,义理还有学术层面上的文本内涵解读以及相应的人文批评与表达。因此,本书改造了桐城派的“义理”一词,将神圣和世俗意义研究结合起来概括圣经的意义研究,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加以阐述。

第三部分是“圣经考释学”,其中的“考释”一词是笔者结合中国经学研究的“考据”概念而提出。1)所谓“考”,乃与桐城派的“考据”相似,相当于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包括传统和现代的方法,前者如中国经学中的“小学”(即语文学)方法(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语句等校勘、考证及其他笺注方式)。后者如现代的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和近现代解经学(Exegesis)的低等和高等批判法(如经文批评、形式批评、来源批评、编修批评等)。定量分析着重于用数量关系揭示事物的根本特性,即通过精确测定的数据和图表反映事物的现状、类属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不确定的、模糊的事物变得相对确定和清晰。中西比较方法以确凿的语言文献材料和事实根据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却是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进行学术综合与融通。概言之,实证性研究方法强调用证据和材料说话。2)所谓“释”则主要是“诠释”,包括中国经学中的“释义”和圣经研究中的“诠释学”,其中各种理论和主义往往被运用到诠释之中。因此,这部分主要在“圣经解经学”和“圣经诠释学”中加以阐述。

第四部分是“圣经辞章文学”,主要是圣经文学研究。其实,在桐城派中,辞章本为学术研究的视界,建构其逻辑框架,调试其论证理路,权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这属于学术研究表述形式的

层面。但本书所说的辞章,不仅指文章辞藻,而且指更为本质意义上的逻辑论证框架的建构、研究对象范围的设定、论证思路和方法的选择、写作风格与研究对象的适配等。辞章的巧妙运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基本的学术技巧。在本书所言的“圣经辞章文学”中,主要以“圣经文学研究”来涵括上述内容,既包括了我国经学中的辞章表述研究,又包括了西方的圣经文学研究。在此,虽然笔者明确指出“辞章”与“圣经的文学性研究”相似而不同,读者可能会对此有所批评,笔者将谦卑地期待改进。

三者之中,考释贡献材料和释义理论,辞章文学设定表述方法和艺术性,而义理则整合神学和人文学内容,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多样,若归之于考据(实证研究)一途,虽验之凿凿,殊无意味;若超越文本层面作抽象发挥,则凌虚蹈空,难以服人。救偏之道,在于突破传统学术研究“义理派”、“考据派”、“辞章派”的门户畛域和分途模式,努力在现代学术研究层面上进行新的整合,既开拓“考据”(实证研究)的新方法,又把“辞章”(学术论证)置于严谨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从而使“义理”的阐发不致超越学术层面而堕入纯粹的抽象思辨。所以,本书强调,既应当辨别大的立场(考据之实),又需要处理小的细节(辞章之虚),尽量使以材料(“考据”)为基础的学术论证(“辞章”)与“诠释”理论相结合,从而能够准确传达研究意图及其结论(“神圣和世俗的义理”)。

所以,笔者所倡导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在坚持实证性的考据“解经学”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充分结合“圣经诠释学”、“圣经神圣义理学”、“圣经世俗义理学”和“圣经文学研究”等视角,来努力解决考据类的形式批评和实证性研究所带来的狭隘性和偏颇,不但视圣经为基督教的经典,而且视其为人文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努力全面地研究圣经。在诠释方法上兼顾了教会教义、历史观点

与世俗的意识形态批评。^①

四、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文学

不同于教会把圣经视为上帝的话语,也不同于世俗社会将之视为人文历史记录,一些学者把圣经视为文学作品(The Bible as a Literature)。这种被称为圣经文学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的主要学理根据是传统文学理论视野中的圣经文学性(The Biblical Literature in the Light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ory)。文学批评中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也都被用来对圣经进行文学性的研究。

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圣经的修辞特点(The Rheto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ble)特别受到了强调,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圣经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如圣经与世界文学(The Bible and the World Literature)以及圣经与某国文学的比较被广泛研究;而在中国学界,则又专门注意了圣经与中国文学(The Bible and Chinese Literature)的比较。

诠释学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到圣经文学批评中,如结构主义批评(Structuralist Criticism)、叙事学批评(The Narrative Biblical Criticism)、读者反应批评(The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等。现

①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9年秋季号的第31期发表了由钟志邦教授和游斌教授策划的“圣经研究与中国学术”专辑,除去“神学论题引介”之外,收录了六篇圣经研究的专文。根据弗雷(Hans Frei)的神学类型说,游斌将圣经研究也分成了五类:一是“将宗教群体约化为纯粹的社会实体,从而圣经只是反映社会或文化意识的文本”;二是“以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某种符号体系来处理圣经文本”的研究类型;三是“强调在对圣经研究的诠释学与对圣经进行文化和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之间建立关联,但这种关联又并不先在地预设某一种偏向”;四是“以贴近信仰传统的态度来进行有助于信仰理解的神学建构,将神学思想视为圣经诠释的内在法则”;五是“纯粹的认信主义,认为圣经一字一句皆为‘神的话’”。游斌:《走向汉语学术语境的基督教经学》,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31期,2009年秋季号,第50页。

在从大国的视野来看汉语学术圣经文学研究,可以发现,其中以“世俗的意识形态批评法”来研究圣经的特色和倾向比较显著。

其实,圣经的诠释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永远无法完全成熟,也很难获得完全一致的理解,我们需要认识到汉语学术圣经学的特色与局限,不可将之视为诠释圣经的权威,因为它只是众多诠释中的一种而已。

犹太人传统中就对希伯来圣经进行了解说和诠释,基督教诞生以后,早期教父们亦使用字面解读和灵意象征等方法来解说和诠释基督教的圣经。历经中世纪和宗教改革,圣经一直被以不同的方法研究着。在历史批评法诞生之前的中世纪,一些研究圣经的犹太学者就已经针对《旧约》提出很多科学性的宝贵意见。历史批评法的圣经研究诞生于18世纪,及至19世纪末期成了主导性的圣经研究方法,而促成以之为核心的释经学(Exegesis)的诞生,它注重对希伯来圣经、《新约》的资料来源、犹太古代传统以及早期基督教进行研究。这门分支学科逐渐与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起占据了圣经研究的主要舞台。传统的释经学主要使用语言学、历史学和其他方法来处理下述几方面问题:分析与翻译相关的核心词语、考证一般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确认某个段落的有限性、研究文本之中的语境。尽管解经学主要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使用的方法,其他宗教文化如中国的经学也很注重这种方法,称其为“小学”或“语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圣经研究学界开始使用多元批评方法;当时的历史批评法(Historical Criticism)主要包括来源批评(Source Criticism)和形式批评(Form Criticism),前者努力探索圣经现有版本的作者或编辑者所使用的资料来源,后者努力发现圣经文本的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40到1960年代,圣经考古学和圣经神学运动逐渐兴起,因为Nag Hammadi文献在1945年及死海古卷在1947年的发现,促使圣经考古学得到大力发展。

过去几十年内,圣经学者们注意到了历史批评法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发展出一系列新方法,更加关注圣经经文本身及其读者,为圣经研究打开了一些新的视角;比起“历史批判法”来,现在最流行的是“意识形态批评法”,如从文化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的视角对圣经进行研究。现在的圣经神学研究中,方法的多元形成了主要特色。圣经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从属于“意识形态批评法”之中。

因此,笔者强调,在目前的汉语学术语境中,圣经研究不但要从历史批评法的视角进行,而且需要从意识形态批评法(包括文学批评法)和教会教义的神学视角进行。因为不同的视角相互补充,而且方法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真正解决圣经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这本是老生常谈的常识性问题,但考虑到对于大陆很多年轻的入门学生之影响,笔者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次强调方法和路径的多元,免得单一方法形成垄断地位而产生误导现象。

作者黄保罗,芬兰籍华人学者,哲学与神学双博士。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生导师、兼职教授研究员,中国吉林大学匡亚明讲座教授、厦门大学与兰州大学客座教授及多所大学特邀教授。著述集中在汉语学术神学、儒基对话、道家与楚文化等方面,中文代表作有《汉语学术神学》(2008)、《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2009)、《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主编之一,2004)等,外文代表作有 *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2009 Brill), *The Earliest Bamboo Slip Versions of Laozi and Taiyi sheng shui and No. 1 Guodian Chu Tomb* (1999 Tokyo) 等。并主持、制作和出版电视系列节目《价值中国——保罗访谈录》26集(山东教育卫视与芬兰电视台)及《家情》、《潮思》、《世相》等著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